



中华民国史丛书

陈氏兄弟果夫立夫，在国民党中央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他们所把持的从 CC 到中统的特务组织，势力更是渗透国民党的各个角落。功高主疑，权重遭嫉，二人仕途虽一帆风顺，却也不无波折。该书详细叙述了兄弟俩托庇父辈的发迹经历，重点介绍了他们对 CC——中统这一特务机构的惨淡经营以及该机构产生、演变、没落过程。

二陈和 CC

范小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hua minguoshi congshu



中 华 民 国 史 丛 书

顾 问：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庄 方庆秋 毛 磊
史全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森 段云章 张文惠
张宪文 郭绪印 徐辉琪
黄美真 蒋湘炎 靳德行

二陈和 CC

范 小 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二 陈 和 C C

范小方 著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61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册

ISBN 7-215-02122-X/K·354

定价 9.10元

621-5036

编 辑 说 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

恰当的分析 and 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前 言

还在1985年，我参加毛磊先生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撰写工作时，由于承担的是二战时期国共关系一章的写作任务，在写作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有关陈果夫、陈立夫及国民党CC系的材料，因此，萌发了写二陈兄弟与国民党CC系的想法。在《国共两党关系史》写作任务完成后，便集中一段时间专门作了一些搜集资料的工作，但所得不多，收效甚微，曾一度放弃写二陈的念头。1986年，我在写作《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过程中，又搜集到一些有关二陈的资料，因此，写二陈的想法又死灰复燃。1988年9月，陈立夫提出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后，成为海峡两岸国人关注的热点人物，我对二陈的兴趣更加浓厚，在戴季陶书稿完成后，便一鼓作气地写了全书稿的大部分，但仍感到内容的单薄与资料的不足，于是，又辍笔了一段时日。感谢河南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给了我很多鼓励，并希望我多搜集资料，完成写作。于是，我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补充资料的不足，整理、修改原稿，完成最后部分，这样，《二陈与CC系》一书终于能够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陈是CC系的首领，他们兄弟俩在国民党内的显赫地位离不开CC系，而CC系的活动始终是在二陈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以至二陈与CC几乎成为同义语。研究CC系不能离开二陈的活

动，同样，研究二陈兄弟，必须将其在CC系的活动作为重点。

—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内便演成了派系林立、门户纷陈的混乱局面。仅就蒋介石的嫡系来说，又分出军事方面的黄埔系，行政方面的政学系，经济方面的孔、宋裙带系，而党务方面，则是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

CC系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进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它最初成立时，基本任务是两个，其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打击、排挤、清除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异己力量，树立蒋介石嫡系的绝对优势，使蒋介石能牢牢地控制国民党；其二，是对国民党外各党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击、摧残直至消灭，树立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绝对优势，造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

南京政府刚刚成立时，国民党内就为谁党的“正统”，由谁来掌握国民党中央领导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上海派各不相让，互相攻讦，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下野，才暂时取得各方和解。

饱受派系争斗之苦的蒋介石深知要战胜其他派系，必须发展自己的嫡系，便指使陈果夫与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于是，以拥蒋为主要目的之一的CC系应运而生。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由于各派利益继续发生冲突，演成中央派与地方实力派的纷争，发展到以兵戎相见，酿成一次次军阀混战，在战争中，国民党内分裂成更多的派系，一时出现了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再造派，还有丁惟汾派、孙科派、冯玉祥派、阎锡山派、桂系李、白派等，加上原有的西山会议派，煞是热闹。另外，由于蒋介石的种种倒

行逆施不仅违反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愿望，而且也违背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意愿，这就引起了一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士的不满，原来国民党内一些左派人士，也纷纷成立组织，另树一帜，如邓演达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

面对国民党内这种严重分裂的现象，蒋介石深感头疼，他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说：“要打破困难的重围，开辟今后的生路，除开确确实实的恢复我们的团结精神、造成全党一致的力量，别无其他的办法。”^①但怎样实行团结呢？蒋介石的办法是镇压反对派、发展嫡系势力，造成嫡系控制国民党的一统局面。因此，他极力支持二陈、支持CC系，让其大力发展，而CC系也为蒋介石弥平党内各派系尽忠效力。

CC系成立后，为了打击各地方派系，在各省普遍设立特务机构，从事各种特务活动，为蒋介石提供情报。如CC特务周洸正曾秘密潜入广西活动二三个月，调查李宗仁、白崇禧桂系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和人事关系。CC系还派大量特务深入阎锡山系、刘湘系、龙云系等派系，从事搜集情报的特务工作。中原大战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CC系便派特务“郑伯豪、张旆、袁更等携带电台到北平、天津活动，电台分别设在东交民巷和天津租界，为蒋介石搜集情报，直接与南京联系。”^②对国民党一些派系的高层领导人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常有CC特务的监督。

对国民党左派人士，CC特务更是不肯放过。如何香凝住处的周围，便常有CC特务的活动，甚至连孙夫人宋庆龄也处于特

① 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开幕式演说词》1931年11月12日。

② 《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务的监督之下。邓演达积极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被CC特务侦得活动行踪，并收买叛徒陈庆斋，在陈的告密下，CC特务伙同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举逮捕了邓演达及临委负责人罗任一、邓维亚、周竞西、刘奎等11人。^①后来，CC特务又到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破坏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抓走其负责人余洒度等20多人。

总之，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CC系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扩展，操纵的部门越来越多，使国民党成为陈家党，成为蒋系势力的一统天下。CC系把持党务后，又插手政府机关、经济系统、文教事业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无处没有CC的影子。

CC系的另一主要任务是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这一任务越到后来越是突出，甚至逐渐成为其唯一的任务。他们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通过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凭借其政权力量，大搞“清党”运动，极力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的特务遍布国中，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监督和镇压，造成“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的极端恐怖，他们通过其控制的宣传机器，千方百计地宣扬假三民主义，对人民实行思想禁锢。正如周恩来在谈到国民党内三个特务组织系统时所说：“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他胚胎于1926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

^① 《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①

由于CC系为蒋介石的统治扫清了道路，所以深得蒋的信任和喜爱。当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蒋介石嫡系内部矛盾深化，黄埔系与三青团联合起来集中攻击CC系时，蒋介石便痛心疾首地告诉三青团代表和CC系的其他对手说：“你们要知道，党是我交给他们（指CC——著者）去办的，如果没有他们，党也早就完了。你们现在这样闹，反对他们，也就是反对我。”^②这说明，CC系是国民党内以二陈兄弟为代表的一股政治势力，而蒋介石则是他们的总后台。他们的政治活动均在蒋介石利益范围内进行，在政治上来说，是反共反人民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一度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抗日，而作为蒋介石嫡系的CC系，其政治态度与蒋介石保持了一致。他们是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也主张国共合作，他们一转以前顽固反共的态度，向共产党表示好感，对此，中共负责人任弼时当时就给予正确分析和肯定，他说：“CC系在民运方面，与我们争夺领导有些冲突，但因他与复兴社互相争夺势力的扩大（复兴社想向党与政府系统中发展，而CC亦想向军队及政府系统中发展）而引起冲突，有时向我们表示好感。他们是希望国共两党在抗日上合作的，故对于复兴社利用托匪破坏合作，表示不赞成。”^③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5页。

② 《吴鼎昌回忆录》（台北）1969年版第226—227页。

③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193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07页。

正是根据CC系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其采取团结合作的友好态度，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各派别（如CC、黄埔）可在个别的问题上与之采取统一战线的行动。”而将复兴社摒除在外，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CC系的进步所给予的肯定。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CC系随着蒋介石的发动内战而日趋保守，他们顽固反共，镇压人民的反抗，成为“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小集团”，而“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①在这种情况下，CC系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国民党由于CC系的长期控制变得日益腐败，另一方面，CC系中一些中下层干部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腐败又产生不满情绪，但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等人造成的，因此，矛头所向，直指元老派和政学系人物。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已经是十分积弱，组织松懈，纪律缺乏，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却煞费苦心地勉强维持着门面，再也看不到乐观地奔向未来的那种朝气，这就越来越引起更多人的不满。CC骨干人物、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说：“我们相信，‘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②CC人物刘不同也批评国民党“尽管党是三民主义的党，但他与三民主义学说毫无关系”。^③因此他们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革新。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337页。

② 《革新周刊》创刊号1946年7月。

③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CC系中“革新”分子的议论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讨有关政治改革的计划，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国民党六中全会和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对党员进行总清查，甚至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包括了他们关于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但到1947年以后，《革新周刊》停止发行，CC系的改革运动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因为这些革新分子要赶走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而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与蒋介石有着深厚的家庭、历史、经济等诸方面的联系，是蒋介石统治的坚实基础，赶走他们，蒋介石岂会答应。就是二陈也不敢支持这些革新分子，有一次，革新分子写了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想让陈果夫转呈蒋介石，但陈果夫拒绝传递，理由是对蒋的批评太露骨。陈立夫也不赞成革新分子的作法，认为太激进了，当《革新月刊》请他写文章支持时，他只是写了一篇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哲学文章。总的来说，革新分子要求对国民党进行革新、改造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但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在当时浑浊的国民党官场中无疑是吹进了一丝清新的风，客观上也有利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

CC系虽然出现了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吹战争，拒绝执行政协决议，叫嚷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覆灭的命运。

二

二陈是CC系的创始人和掌门人，CC系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在他们的指挥下干的，因此对他们的评价与对CC的评价应该说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二陈又是单个的人，在CC系的活

动只能是他们人生里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人生历史，他们人生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评价也应是多方面的。再加，CC的最大后台是蒋介石，所以，二陈即使在CC的一些重大活动也必须听命于蒋介石，他们的言行也有违心的时候，他们的活动一般来说，与CC系保持一致，有时却并不相同。

二陈中的陈果夫，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革命期间，陈果夫为黄埔军校筹办物资，招兵招生，也做了很多努力，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陈兄弟的转折点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完全走到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对立面。此后，他们为了反对共产党，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在国民党内创立了CC系，组建了中统特务组织，并带领CC特务进行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蒋家天下陈家党”为当时国人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CC理解为二陈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为蒋介石效力的过程中，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做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如陈果夫主持的治理淮河，应该说是一项有利民生的工程，他在担任江苏省主席期间，也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虽然这些做法并不能根本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但客观上对人民多少是有好处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二陈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地体现出来，他们主张抗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示“余酒不进敌樽，梅花不受敌瞞”^①，要求收复失地，并为抗战

^① 陈果夫：《挽刘季平先生》1938年。

作了很多工作。他们还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两党携手抗战，为此，二陈主持了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使两党原来血海深仇的对立关系出现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局面。二陈的举动当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周恩来在给他们兄弟俩的信中给予高度评价：“敝党数年呼吁，得俩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①这一时期，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在主持高校播迁、改革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二陈的思想是保守的，并由保守趋向顽固，由与共产党合作趋向反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的原因时就指出，这是“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而达到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②由于他们的反共，使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兄弟俩越来越失望，当抗战胜利前，陈果夫重返组织部，取代朱家骅担任部长时，中共负责人董必武就指出：“朱家骅去职，CC登台，弄得国民党内部更加离心离德，对国家民族毫无贡献。”^③

二陈在掌握党政大权的同时，还以极快的速度向经济界渗透，在短时期内一举而成为可与孔宋裙带派相抗衡的一大经济势力，因而不不断引起孔、宋的反对，甚至蒋介石也为之不满，1940年，陈果夫进入中国农民银行担任董事，1942年，陈立夫自行组织工矿银行，并自任董事长，对此，蒋介石大为震怒，斥责陈立夫说：“以一教育部长而与土商经办银行，风纪何在！”^④由于二陈在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

③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的报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67—768页。

④ 《唐纵日记》1942年9月18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

经济方面的迅速扩展，一时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合称为中国四大家族。笔者认为，四大家族应该是一种经济范畴的名词，它的内涵是指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陈氏家族也并不是指陈果夫、陈立夫的单独个人，而是指以他们兄弟为代表的国民党党营企业和国家金融事业的官僚资本，这种靠国家行政权力和巧取豪夺而膨胀起来的官僚资本，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国民党高层次的人际关系中，二陈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最初，蒋介石从对陈其美感恩的心理以及江浙地域观念和江浙财团的联系等因素出发，对二陈是极力培植，视为亲信中的亲信，二陈也正是因为有蒋介石的荫护，才能迅速在国民党内崛起，这种依赖的关系使二陈只能当蒋介石的忠实臣僚。但二陈又决不同等于蒋介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二陈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与蒋介石同出一辙，即要求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在实现其统治的方法上，二陈与蒋介石之间，陈果夫与陈立夫之间，也有席地之别。陈立夫鼓吹专制，强调镇压，他认为强权是万能的，对各方面的反抗，只有彻底镇压，才能维持其统治，他多次强调，要与共产党拼实力，谁的实力强，谁就能得胜。他主张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认为这是当然的“义务”，各党派对一党制的批评，“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他主张民主不能太多，国民大会代表必须指定，说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①而陈果夫则主张镇压与怀柔相结合，他在主政江苏时，便提出了他的所谓政治理想，即“第一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安乐的江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9日。

苏”，“第二个理想是要做成一个健康的江苏”，“第三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富足的江苏”，“第四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文化高尚的江苏”，这些理想确实比赤裸裸的镇压对人们有吸引力，为了实现这理想，陈果夫整肃吏治，改革民风，发展生产，提倡卫生、加强教育，行政统治方面，他强调“一方面尽量改良政治”，“多做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引用‘治乱用重刑’的方法，不顾一切的痛剿”^①，镇压人民的反抗。

由于二陈与蒋介石在统治方法上小有不同，他们在某些时候某种问题的处理上也会与蒋介石发生分歧。另外，由于二陈的势力发展过快，蒋介石又时时予以防范、予以限制，使之与其他派系互相牵制，这是蒋介石的用人方法与统治术，而二陈在受到限制时，也会产生对蒋介石的不满心理和言行。每当这种时候，蒋陈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因此，二陈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常常陷于两难境地。二陈主张少用民主，但对蒋介石事事干预的独裁行为又表示不满。二陈对国民党内贪污腐败现象也十分反感，而且从个人来说，他们在国民党官场中，还是比较清廉的，生活作风比较严肃，工作态度比较踏实。这样，越到后来，不满和反感越是增长，蒋陈关系也逐渐恶化，以致败走台湾后，蒋介石将国民党失败的责任干脆推到二陈及CC系身上，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陈立夫则以出走美国相抗议，蒋陈关系几于破裂。所以我们评价二陈时，并不把他们看成僵硬不变的死铁一块，对他们的反共，我们坚决否定，而对他们在一定时期，在某件事情上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过积极作用的方面，我们都应予以肯定。同时，二陈在行政、经济、水利、地政、合作、文化、教育、新闻、医药

^① 陈果夫：《苏政四年之回忆》、《小意思集》第6页。

卫生、人事等方面都多有论述，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来研究这些思想时，也应肯定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

特别是80年代后，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表示极大关心，提出很多建议，这无疑是爱国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爱国不分先后，对陈立夫的表现，予以热切欢迎和充分肯定。1981年，中国共产党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向台湾14名最著影响的人物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大陆和故乡看一看，谈谈心，这其中就包括陈立夫先生。1988年，当陈立夫等人向台湾当局提出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后，中国共产党给予更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认为他们的提案“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①。

三

二陈与CC系，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和特殊现象，他们的出现，适应了蒋介石统治的需要。如今，CC系控制国民党的时期已成为历史，二陈中的陈果夫早已作古，当年年轻气盛的陈立夫已是满头银发。二陈与CC系，应该是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是十分欠缺。港台方面虽出过有关陈果夫生平、传记、资料的一些书籍，但并不能正确地评价其一生的功过。而陈立夫，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其生平事迹的传记。在大陆，至今还没有介绍二陈的专著，关于CC系的研究，也只是有几本介绍中统的书，如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统兴亡录》等；

^① 《人民日报》1988年9月7日。